

社会和文本

——贺麦晓学术研究述评

陈太胜

内容提要 汉学家贺麦晓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工作,先后出版过三部相关学术专著。“社会和文本”这一主题代表了他用文学社会学方法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主要旨趣和方法。在《雪朝》诗集的相关研究中,贺麦晓聚焦于这八位诗人的诗及相关诗学文本。《文体问题》一书则以文学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学社团和文学杂志这两个对理解中国现代文学来说相当重要,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无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海外都罕有研究的对象领域。在《中国网络文学》一书中,贺麦晓将中国当代网络作为一个新的文学空间(a new literary space)来看待,并研究这一新的文学空间如何运作又如何改变了新千年来的中国文学状况。“社会和文本”这一理论视角,促使贺麦晓特别关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场”和“空间”问题,体现了贺麦晓个人的学术旨趣,即他更关注特定文学活动空间中的人和事,而不是孤立地研究文学文本问题。

关键词 文学社会学 文学文本 文学场 文学空间

DOI:10.16228/j.issn1008-0163.2019.03.003

“社会和文本”问题,可说是欧美文学研究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来,以新批评和结构主义为代表的文本研究方法式微之后,所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简言之,自此之后,文学文本被视作社会性的产物,即一种在特定社会语境中产生的“话语”,研究者关心谁在说,在什么语境下说,及说的话语本身体现了怎样的社会结构。“社会和文本”也是汉学家贺麦晓(Michel Hockx, 1964 -)的专著《文体问题——现代中国的文学社团和杂志(1911 - 1937)》中第三章的标题,代表了他用文学社会学方法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主要旨趣和方法。贺麦晓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工作,先后出版过三部相关学术专著。这三部书体现了他对中国文学研究持之以恒的兴趣,个人独特的研究角度,及在研究上不断的进展。

出生于荷兰的贺麦晓,1987年在汉学研究方

面素有声名的荷兰莱顿大学完成汉学本科课程,并于1994年在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学术研究的起点阶段,贺麦晓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选择的是中国早期新诗。用他自己的说法,这主要是由于受到了他的老师,也就是著名的汉学家汉乐逸(Lloyd Haft)的影响。^①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名为《雪朝:八个通往现代性路上的中国诗人》,以出版于1922年的《雪朝》诗集为集合点,研究收于集中的八位中国早期新诗人。《雪朝》是一部一直不太为研究者所重视的中国早期新诗集,它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种(这明显地标在书的封面上)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诗集除由郑振铎写的短序外,共分八集,每位诗人一集,收诗数量由十多首到四十多首不等。八位新诗人按目录先后顺序分别是朱自清(19首)、周作人(27首)、俞平伯(15首)、徐玉诺(48首)、郭绍虞(16首)、叶绍钧(15首)、刘延陵(13首)和郑振铎(34首)。贺麦晓的这部专著,是最早也是迄今为止

唯一一部关于《雪朝》的研究专著。贺麦晓由这八个诗人的诗与诗学切入,研究他们1917-1922年间的新诗写作和诗学观点。根据自己的研究思路,贺麦晓分章逐个讨论了这八位诗人。除第一章是导论外,第二章讨论周作人,并主要以其名作《小河》为中心,第三章讨论徐玉诺和叶绍钧两人,第四章讨论俞平伯和朱自清,第五章即最后一章,讨论刘延陵、郭绍虞和郑振铎。

为了更好地讨论研究对象,贺麦晓动用了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在讨论周作人时,尤其关注时人对《小河》这首诗的评论及其对当代诗学景观的影响。通过对《小河》这首诗“人格化”(personification)、自由诗的形式及白话语言的研究,贺麦晓认为:这首诗确实体现出了某些新的,即现代的东西,远远超出了一般读者对诗的期待;周作人以自己的写作向同代人表明,新诗是大有希望的文体,且已经成形。像对徐玉诺的诗的分析,主要集中于其记忆、忧愁、怀乡和自然四个主题。在考察俞平伯和朱自清时,贺麦晓在评述他们两人有关文学尤其是诗的观点的基础上,特别关注他们各自的诗歌理论及实践在1917至1922年间的变化。而在他们两人身上,其中相对稳定的因素,则是对中国传统诗学的创造性使用。像俞平伯的《凄然》一诗,将传统的格律“融铸”进新诗,在著作中,贺麦晓以该诗第三节中的七行诗为例,作了仔细的分析。通过研究,贺麦晓令人信服地指出,这两个诗人,在不同的时期,出于不同的理由,都受到了《楚辞》的影响。像俞平伯的《小劫》有明显的“九歌”中的一首和《离骚》的影响痕迹,而朱自清的《毁灭》,则更让人想到《招魂》和《大招》。^②《楚辞》在个人表达方面激励着他们两人,而别的古典作品,在声音和音节方面发挥着相类似的功能。贺麦晓认为,他们两人对新诗的贡献,最主要的,无疑是为白话语言寻找理想的声音和音节,这是胡适开创的事业。胡适所说的自然的声音和音节,恰恰是朱自清早期新诗写作实践中内在追求的东西。^③不难看出,贺麦晓尝试着穷尽各种有关诗的阅读和研究方式,来对《雪朝》这样的中国早期新诗作品集作出自己独特的解读。

贺麦晓的这种研究,自是有其用心所在。在接触到相关领域的研究之后,他准确地认识到,不管是在中国还是西方,对中国早期新诗的研究,总的来说,只重视少部分著名诗人,而对其余则几乎全予以忽视,这导致没有公平地对待早期新诗写作的多元性质。在《雪朝》中,贺麦晓主要的学术目的,即是要证明早期新诗人的写作本身丰富的价值。考虑到这是一本用英文写的汉学著作,贺麦晓的这一努力,就更为难能可贵。这本书中好多翻译成英文的中国新诗,都是第一次出现在英语世界里。贺麦晓本人在前言中就曾特地指出,他希望借此证明中国现代第一代新诗人的写作,“并不完全是不成功的”^④。

贺麦晓的博士论文的另一学术贡献,是颠覆了一般的对《雪朝》这一诗集的整体评价。一般评论者都认为,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雪朝》很好地体现了该社团“为人生而艺术”的宗旨。而贺麦晓通过自己细致的研究,倾向于认为,《雪朝》集子里的诗人,通过自己的写作实践和理论主张,在实际上偏离了某种“主义”,并从来不曾忘记“艺术”。也是在对朱自清和俞平伯的研究中,贺麦晓指出,他们诗学的“反传统主义”只指向一些预设的诗学标准,这使他们也可以怀疑某些新的标准,像当时流行的小诗,或徐志摩的格律诗,这甚至使他们可以接受某类与他们自己的“主义”相违背的诗,像汪静之的爱情诗。“正是对诗艺问题和个人表达的孜孜以求,可以使他们不完全臣服于某种主义,最后甚至可以抛弃它,为自己打开通向现代性的道路。”^⑤《雪朝》向我们展现的中国早期新诗的图景,因此比一般的认识要更为多元,在诗学上也比通常所认为的那样要更为复杂。就像贺麦晓在结论中指出的那样:“通过丰富的证据,可以表明:这些诗人确实思考诗的本质,他们也确实让自己从体察到的传统中释放出来,他们也确实没有严格遵守‘为人生而艺术’这一信条,没有把自己局限于‘现实主义’这一领域之内。可以肯定,他们都是热忱的实验主义者,高兴地冲向一条又一条死胡同,跌跌撞撞地,跌倒,又重新起来,一次又一次重新开始。然

而,这么做的时候,他们渐渐地形成方向感,从自己的错误中获得教训,最后走上一条新的路,一条一直横亘在他们面前的路。”^⑥

通过自己的研究,贺麦晓赋予了《雪朝》诗集出版的年代,即1922年,以某种特殊的文学史意义。这与贺麦晓全书研究的重要结论相关,即认为《雪朝》代表了1922年中国新诗发展的一种转向,这是趋于“以个人表达为重心的独立的诗和诗学的转向”。他认为导致这种转向的原因,则是早些年开始的诗学张力和对新诗边缘化的接受。这种转向也使《雪朝》成了一本处于“现代性边缘的诗集”。^⑦在对《雪朝》八位诗人的讨论中,尽管贺麦晓也是在“传统”和“现代”的背景下来定义“现代性”一词的。但他对现代性的认识,由于以中国早期新诗作为背景,还是独具匠心的。他曾明确指出,“明确反传统的诗并不必然是现代的诗”。他使用“现代”这一术语,用来指建立在新的和独立的诗学基础上且对体察到的传统有创造性使用的诗。贺麦晓认为,那类主要目标旨在将体察到的传统颠倒过来且没有提供独立的可替代方案的诗学,则应被视为是反传统的,而不是现代的。^⑧贺麦晓这一对文学现代性的认识,是他评价《雪朝》及其潜在的诗学的基本标准。这种将“反传统”与“现代”分开来谈论,并不将两者粗略加以等同的做法,即便是在今天的中国文学和文化研究中,仍然还具有具体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

确实,在《雪朝》诗集的相关研究中,贺麦晓更多地还是聚焦于这八位诗人的诗及相关诗学文本,甚少触及与文本有关的社会层面。但从有关《雪朝》的结论中,我们看到了他将《雪朝》诗集体现的诗学与作为一个社团的宗旨区分开来的可贵努力。同时,他在文中对《雪朝》诗集各人的诗及诗学所做的接受和影响的讨论,也可看出他试图使用的是接受美学的理论和方法,这大概可以看出来,贺麦晓本人关注并喜欢那些注意文本以外的东西的理论。或许,正是这种开放性,使他有可能将自己的研究指向与文本有关的社会层面。在

《雪朝》诗集的研究中,贺麦晓触及到了八位诗人都参加的文学研究会,也谈到了杂志《新青年》。或许,这与贺麦晓后来将自己的重心更多转向文学社团和文学杂志的研究,也并不是没有直接的关系。

贺麦晓的第二部专著,即《文体问题——现代中国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杂志(1911-1937)》,其英文版出版于2003年^⑨。而其研究则始自20世纪90年代晚期,几乎是作者在完成并出版其博士论文不久之后。1996年1月24日至26日,即将在莱顿大学完成两年博士后研究的贺麦晓,以会议召集人的身份在莱顿大学组织了名为“现代中国文学场”的会议。会议公开以源自法国社会学家布狄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的“文学场”概念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⑩同年,贺麦晓还在《读书》杂志发表了介绍布狄厄有关文学社会学思想的文章。文章对布狄厄“反观社会学”相关的“场”“生性”(一般译作“习性”)和“资本”等概念作了较系统的介绍。^⑪准确地讲,贺麦晓是将布狄厄与文学场有关的文学社会学思想最早介绍到中文学界,并使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

《文体问题》这本书以中国民国时期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杂志为研究对象,揭示了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实践中两个显著的特点,即:作家对在文学社团中工作的强烈偏爱和对在文学杂志上发表的偏爱。在研究方法上,贺麦晓通过对阿尔布莱希特、戈德曼、埃斯卡卡特、贝克尔,尤其是布狄厄与文学社会学相关的概念与学说的评论和综合,发展出新的方法来研究文学社团和文学杂志这两个对理解中国现代文学来说相当重要,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无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海外都罕有研究的领域。该书在勾勒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新近的一些进展及范式转换基础上,详细地描述了一些激发其从事研究课题的理论和方法(第一章)。该书既描述和研究了20世纪早期中国两个重要的文学社团:南社和文学研究会(第二章),也对出现于民国时期的各种其他社团形式,尤其对一些相对来说不知名的但在作者眼里在20世

纪30年代的上海文坛上又是特别重要的团体作了研究(第三章)。该书还提出“集体作者”和“平行读者”的概念,并以之对20世纪10年代中后期的杂志,特别是《眉语》《游戏杂志》和《新青年》进行了研究(第四章)。

《文体问题》这本书的关键词,即是标题中的“文体(style)”这个概念,作者用它不仅仅指语言、形式和内容的聚合物,而且也指生活方式、组织方式(像在社团中)和发表方式(像在杂志中)的聚合物。正是通过这个概念,贺麦晓将文学研究中的文本因素和非文本(社会)因素整合起来,同时使文本分析成为更具文学社会学倾向的整个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对陈衡哲和刘半农的诗的分析研究)。贺麦晓有意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心转移到文学社团和文学杂志这两种“文学实践”上来。与惯常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对文学文本单一的重视和强调不同,贺麦晓将文学社团视为一种“体制”(institution),更重视参与文学生产的人的活动及其产品的研究。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学的特有现象,是出现了众多的文学社团,及各种文学论争。向来,人们更聚焦于社团间观念上的争论,而对当中使用的策略及背后的体制性因素却关注甚少。贺麦晓在这方面,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式。按陈平原为这本书的中译本序言中的说法,这是由于“作者考虑的是文学社团的类型、功能、自我形象及运作方式,而不是某一社团的文学史地位”^⑫。例如,关于文学研究会的研究,贺麦晓将其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关注其组织方式和自我形象,为确立自己在文学场中的地位所采用的一系列运作方式。一般学者只关注一个文学社团的主要成员及文学主张,贺麦晓关注一个文学组织通常被人忽略的“组织”和“体制”因素,如象征资本的积累、财政资本的积累、网络建设和提升、会报、分会、明信片、合影和丛书的出版等问题。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通过布狄厄所谓的“双重的断裂”,将传统文学和商业小说作为对立文体,同时以欧美文学经典及与之相关的把“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区分开来的文学价值为基础阐释了“文学”概念。通过细致

的研究,贺麦晓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推想,这里讨论的对立面,不是客观的对立面,而是由参与的代理人和他们在文学场内有效的位置决定的特定观念转变而来的对立面。”^⑬换言之,贺麦晓质疑的是,作为一个文学社团的集体的文学主张,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发起人所采用的“策略”决定的。照此方法,我们就不难理解,无论是文学研究会,还是后起的创造社,都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塑造成“先锋”独一无二的“文学”概念的阐释者。这实际上便是布狄厄所说的文学场内的某种“占位”行为。像中国现代被广泛采用的“无名作家”这一话语,便是广泛的“占位”行为与先锋话语的一部分。浅草社最先使用的“无名作家”这一话语,后来一再被别的文学团体所使用,因为它“不仅仅代表未开发的文学人才的资源,也代表着比‘压制’他们的成名作家更有才华和更愿意献身于文学的艺术家共同体”^⑭。

将以布狄厄为代表的文学社会学方法引入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这一创举本身自然值得书上一笔,但是,究其根本,方法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方法如何为我们切入和观察研究对象提供了新的视角,并如何使我们对研究的对象有新的认识。文学社会学的方法,除了上面提到的对文学社团和文学杂志新的观察而外,我觉得,另外相当重要的一点,是为民国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场”的独立性所做的有效辩解。书的第六章在探讨“文体中的个性”时,从民国时期广泛存在的“骂”这一批评现象出发,对围绕着曾今可创办的杂志《新时代》及“词的解放”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贺麦晓最后证明,这场有关“词的解放”的论争的基本内容,是围绕着道德美学展开的,而不是政治话题。尽管民国那些年中国的政治形势是紧张和两极分化的,但在这些“文学”论争中,政治只起到了微弱的作用。贺麦晓认为,这一事实证明“这个非凡的文学场的力量和威望,它可以容纳这么多不同的文体和立场”^⑮。尽管,这场论争的参与者,本身甚少从文学的立场讨论问题,似乎他们更关注参与者的道德水准及所写作品内容的政治方面,但有些怪异的是,不管你承认

与否,文学场还仍然坚持着自己相对独立的运作方式。

民国时期“文学场”的这种独立性,尤其体现在有关文学审查的问题上。就像陈平原认为的,全书第七章,也就是研究民国时期的文学审查一章,称得上是全书最为精彩的一章。^⑩这一章从文学的自治和国家权威的角度,研究审查员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文坛的出现,如何导致文学共同体紧密团结,同时对文学“折射”(refract)这些政治力量的能力进行了探讨。这一章通过细致的研究解决了文学史上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即20世纪30年代中国(尤其是上海)的文学审查制度与文学力量的关系。向来,我们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只集中于有关文本的相关观点,及一些文学史上形成套路的特定见解,即政治对文学的压迫性影响。而贺麦晓提供了特定的新的视角,即那个时代文学审查(其背后是政治)对文学场的作用与影响,主要的仍然是在文学场内部完成的。通过对《中国新书月报》和相关的出版家团体、1934年的149种黑名单、1934年上海成立的审查委员会与审查员对上海文坛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贺麦晓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审查委员会的审查员,更多的还是作为文学场内部的作用者的身份起作用的。作者也用令人信服的材料向我们表明,围绕着“左联五烈士”死讯的报道,实际上是有关外部力量侵害很大程度上自治的文学场的例子。从事件一开始,这五位从事过文学活动的受害者,就被放在了1931年被国民党政府处死的23位共产党员的中心位置。尽管他们的死亡实际上是出席一个政治会议的结果,与其作家身份没有任何关系,但这些烈士反复地被与国民党的文学审查制度联系在一起。通过自己的细致研究,贺麦晓质疑了一般文学史教科书的相关观点,并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场,仍然是高度独立的。这或许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民国时期的文学在那个年代实际上非常繁盛的局面。

《文体问题》一书出版不久,张松建即在有关的书评中指出,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它具备了“范式”的价值。^⑪这是很高也很公允的评价。张松建

在详细梳理了汉语学界和英语学界有关报刊和社团的研究情况后,认为贺麦晓的专著在这方面卓有贡献。他也指出,贺麦晓由于自己采用的方法,着眼点并不在于口号与意识形态之争,而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与制度方面。这确实为文学社团和杂志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具有“范式”意义的研究方法。同时,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中文学社团和文学杂志这两个领域的细致研究,贺麦晓得出了民国时期存在不同的写作文体的结论,认为新文学必须仅仅被视作中国现代写作的一种文体,在整个战前的几十年中,它一直与别的文体共存并相互竞争。《文体研究》这本书有关刘半农的一章,在很大程度上是将社会和文本结合起来,对“冲突的文体”进行深入研究的一章(第五章)。贺麦晓着重对中国早期评价不高的诗人,即刘半农进行了研究,尤其关注其在文体的冲突过程中、在新诗的形式方面所作的尝试。贺麦晓通过研究认为,刘半农并不能自由地选择文体,他的各种有关新诗形式富有创造性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他的新文学同道以规范的新诗形式所扼杀掉的。当然,这是一种合理的推测(我们可能还有另外的一些结论,这可能关乎刘半农本人的兴趣及对自己这些文体上的尝试的自我判断),这导致我们的新诗发展在其开始就没有容纳更多的“传统”的可能。中国现代文学存在多种文体的观点,也对近几十年来正在转换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作出了重要的修改和补充。

同时,《文体问题》通过细致的个案研究对普遍的文学实践理论和阅读理论也不无贡献。例如,在第四章的杂志研究中,作者提出了很有创造性的“平行阅读”的观点。“平行阅读”强调的是同一杂志同一期号上的文本在空间上的联系。“平行阅读”的对象不再是狭义的、被抽离出来脱离其语境的文本,其研究要素包括了封面、插图、目录、出版说明和广告等等。当然,这一研究视角,并不是对所有的文学杂志都有用,它尤其适用于民国期间体现出很强的同人性质和个人风格的杂志。

三

《文体问题》出版之后,贺麦晓很快地开拓了另一多少有些令人惊讶的研究领域,即中国当代网络文学。2015年,他出版了新著《中国网络文学》。从民国时期的社团和杂志,转到中国当代的网络文学研究,用贺麦晓自己的解释,并没有觉得是“突然一下就转到另外一个领域去了”,这当中变化并不大,只是从一种发行的权威媒体转而研究另一种媒体,两者都拥有比较分散、寿命比较短、有很多文本和图画的互动等共同的特点。^⑮在《中国网络文学》一书中,贺麦晓将网络作为一个新的文学空间(a new literary space)来看待。高速发展的出版业及相伴随的报纸和杂志,曾经促成和改变了20世纪初以来的民国的文学状况,现在,到21世纪的时候,令贺麦晓感兴趣的,是网络这一新的文学空间如何运作,又如何改变了新千年来的中国文学状况。当然,这一新的空间,并不必然是为传统意义上的“高雅”文学提供的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网络文学的研究就失去了其价值。贺麦晓认为,就像他在书中所证明的那样,网络小说的兴盛本身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极为重要的发展。在贺麦晓看来,网络确实提供了新的文学空间,它已经建立起并还将继续建立起自己的惯例和价值,这是和印刷文学并不完全一样的惯例和价值,即使实际上,印刷媒介和网络媒介是以各种形式交织在一起的。^⑯

贺麦晓这本书研究的是新千年以来十多年,即2000-2013年间的中国网络文学兴盛、发展至高潮和逐渐衰微的情形。就像贺麦晓指出的,网络文学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和别的一些东亚社会)特有的,在西方国家还没有同等规模和范围的相类似现象。因此,作为一本在美国出版,其主要设定的读者是外国读者的情况下,这本书花较多篇幅描述了这一现象在中国最初的出现和随后的发展情况(第一章)。在此基础上,贺麦晓特别给中国的网络文学下了个简明的定义,即:作为中文写作,无论是既有的文学文类还是具有革新性质的文学形式,它都指网上互动语境下

的出版物,并且是要在屏幕上进行阅读的。^⑰

这本书的关注重心,很大程度上与贺麦晓的上一本专著,即《文体问题》一脉相承,都关注文学体制,都将文学实践者及其产生的文本放在具体的社会实践语境中来予以考察。这本书甚至研究实践者在网上与中国出版和文学管理部门的相关体系互动,并不时予以挑战的情形。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本书的目的,是要告诉读者,中国网络文学如何挑战文学成规和制度,又如何如何在特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版体系内运作。我将触及后社会主义混杂的所有方面,包括审美、市场和意识形态等,而文学将是关注的中心”^⑱。

在具体的研究上,贺麦晓注重将现象描述和文本分析结合起来。全书共四章,每一章都有对相关现象的描述,同时又至少包括一个或一组特定作品的阅读和分析。例如,第一章除概述了中国网络文学的兴起和发展外,主要集中研究了第一个成功的网上文学空间,即“榕树下”。这一章还集中讨论了使这个网络空间一夜成名的作品,即癌症患者陆幼青的网络日志。通过对不同时期从网上下载的不同文本及后来印刷文本的细致对比和考察,贺麦晓指出,无论是作者本人,还是支持作者的读者,都企图坚持出版物严肃的文学性质。该书第二章则仔细研究了网上三个很不同的作者。一个是陈村,早在网络时代来临前,他就以先锋小说的实验者身份闻名于世。另一很不同的网络作家是闻华舰,他是中国第一部微博小说《围脖时期的爱情》的作者,与陈村相比,其作品不那么严肃,但很好地突出了社交媒体的社区性质,它不断地跨越小说内容和他在微博上互动的界限。这是实时在线写作的例子,随时接受网友的互动,网友提供的故事有可能很快被写进小说里。这是一个利用各种技巧跨越“作者、叙述者和读者的界限”的小说例子。^⑲第三个考察的是博客名人韩寒,尽管他本人并不在网上发表文学作品,但他早期的博客帖子在正面攻击现有的出版体系方面非常重要。

《中国网络文学》一书的后半部则集中讨论网络文学的两大文类,即网络小说和网络诗歌。

第三章的正标题名为“底线”,这是中国的监管部门对色情小说一类的作品最常提到的一个词。这一章研究在商业上获得巨大成功的网络小说。“起点网”是开创了网络小说商业模式的中文网站,是世界上最常被访问的网站之一。贺麦晓以“起点网”的研究为基础,关注各种文类及网络小说的监管环境。他考察国家监管者如何处理突然出现的数不胜数的网络长篇小说,这些小说都没有通常的印刷出版物需要的“书号”。这当中,尤其关注色情小说在网络上的扩散和监管问题。以“飞卢中文网”为例,贺麦晓通过考察研究“监管和违反”这一课题,看看官方认为什么是色情和淫秽的内容,看看它怎样定义和衡量。通过对有关各方的访问,贺麦晓试图弄清官方对此类文学所能容忍的“底线”到底是什么,还有,文学生产者本身又如何遵守这一底线,并如何去规避。贺麦晓指出,这种道德审查,具有典型的后社会主义出版的特点,国家层面的监管人坚持把“健康的”道德加诸所有读者头上,无论其年龄。在这一章中,选取的个案是一个很特别的网站,即“黑蓝”。这是相对严肃的文学网站,不时推出作家个人小说或诗歌作品集,且还以“黑蓝文丛”的名称推出纸质版,甚至还设有自己的文学奖项。贺麦晓通过这个例子表明,网络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也利用自己的新技术为通常意义上的“严肃文学”作出贡献。

第四章,也就是书的最后一章讨论网络诗歌。如果说,小说是中国网络文学中在经济上最成功的文类,那么,诗在多样性、实验和批评的认可上胜过其它文类。这一章的研究范围由中国大陆的作品扩大到大陆之外,甚至包括由不使用中文写作的作家创造的电子文学作品,当中使用了汉字作为其视觉材料。这一章考察了一些诗歌论坛,讨论这些网络诗歌如何跨越一些边界:诗人和读者间,中国之内和之外,还有,什么被认为在道德上是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在这一章里,他仔细讨论了女性诗人笔名称为“大腿”的被称作“下半身”的作品。这一章的个案研究,把中文网络作品于社会的、政治的、道德的和审美的方面的特性

结合在了一起。

贺麦晓有意识地将现象描述和个案研究结合起来,在具体的研究中,由于将网络文学视为某种社会、政治、道德和审美的结合物,便有可能对它予以文本和社会的双重关注。同时,与那种忽视甚至轻视网络文学的态度不同,贺麦晓在书中严肃地对待网络文学问题,并向我们证明了他选取的这一研究课题对观察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性。通过自己的研究,贺麦晓也一直试图证明,网络文学对中国大陆正在进行的我们通常所谓的“严肃文学”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一点体现在上面提到的“黑蓝”网站中,尤其体现在他对小说作家陈村的研究中。贺麦晓认为,陈村与他同代人不一样,将先锋精神带到了网络写作的领域中。

四

通观贺麦晓上述三本专著,当中其实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便是对诗这一文类持之以恒的兴趣和关注。早期对《雪朝》诗集八位诗人的研究自不待言。在《文体问题》一书中,以专章的篇幅研究过诗人刘半农。在《中国网络文学》一书中,则有对网络诗歌的专题研究。在不同的时期,面对自己选择的不同的研究对象,贺麦晓使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观察和分析中国现代诗歌。我还注意到,贺麦晓还是另一研究领域,即诗人吴兴华的重要研究者之一。吴兴华是大陆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步被学界重新发掘和认识的诗人。2002年,贺麦晓在《诗探索》第3-4辑上发表了《吴兴华、新诗诗学与50年代台湾诗坛》一文,促使大陆学界开始关注吴兴华以笔名“梁文星”发表的系列作品,从而引发了相关更为详尽的考察和研究。2017年,他还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12期上发表了《吴兴华作为现代诗人的生成》一文,对吴兴华研究作了全面回顾和深入反思。

就像本文开头所提到的那样,“社会和文本”问题,是西方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贺麦晓近三十年学术研究的的发展,也很好体现了他对这一理论问题的持续关注。正是这一理论视角,促使贺麦晓特别关注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场”和“空间”问题。就新文学发展早期的20世纪一二十年代,贺麦晓专注研究过社团和杂志及相关的“文学场”问题;对于21世纪初,贺麦晓专门研究过网络空间及网络文学问题。对“场”或“空间”问题的关注,体现了贺麦晓个人的学术旨趣,即他更关注特定文学活动空间中的人和事,而不是孤立地研究文学文本问题。贺麦晓对“文学审查”问题的研究,也很好体现了他的学术旨趣,用他自己的话说,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学,他感兴趣的是整个文学场里面不同的人物。审查官因此“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物,他一方面站在文学场之外来控制文学生产,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在文学场之内,和那些出版社和作者有一定的互动、商量和交流”^②。

一方面,文学研究确实存在不同的角度和方法。因此,我们很难用对文本研究关注不够一类的观点来指责贺麦晓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文学研究就整体而言,也是一件综合的工作,他需要有各个领域、兴趣不同、方法不同的学者的共同协作,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更总体地看到整个文学的面貌。因此,无论从哪一方面看,贺麦晓的研究,正是因为自己特定的视角与学术旨趣,才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①许苗苗《网络文学研究:跨界与沟通——贺麦晓教授访谈

录》,《文艺研究》2014年第9期。

②③⑤⑥⑦⑧Hockx, Michel, *A Snowy Morning: Eight Chinese Poets On The Road Modernity*, Leiden: Rearch School CNWS, 1994, p. 137, p. 138, pp. 138 - 139, p. 186, p. 27, p. 5.

④Hockx, Michel, Preface, *A Snowy Morning: Eight Chinese Poets On The Road Modernity*, Leiden: Rearch School CNWS, 1994.

⑨该书中文版于201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贺麦晓《文体问题:现代中国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杂志(1911-1937)》,陈太胜译)。

⑩有关这次会议的情况,可参阅贺麦晓的相关会议综述,见《“现代中国文学场”国际研讨会》(《世界汉学》第1期,第214-215页)。

⑪贺麦晓《布狄厄的文学社会学思想》,《读书》1996年第11期。

⑫⑬陈平原《〈文体问题——现代中国的文学社团和杂志(1911-1937)〉中译本序》,见贺麦晓《文体问题——现代中国的文学社团和杂志(1911-1937)》,陈太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页。

⑭⑮贺麦晓《文体问题——现代中国的文学社团和杂志(1911-1937)》,陈太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2、97、233页。

⑯张松建《现代中国“文学场”的形塑——贺麦晓〈文体问题〉阅读感言》,《现代中国》(第五辑),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16-226页。

⑰⑱王天红《从中国新诗到网络文学——贺麦晓教授访谈录》,《文艺争鸣》2017年第4期。

⑲⑳㉑㉒Hockx, Michel, *Internet Literature i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29, p. 4, p. 5, p. 92.

作者简介:陈太胜,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